



THE POLITICS OF
THE POWERFUL FAMILIES DURING THE EASTERN JIN



东
晋
门
阀
政
治

田余庆 著



田余庆 著

东晋门阀政治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著.—5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5
(博雅英华)

ISBN 978-7-301-20435-1

I. ①东… II. ①田… III. ①政治制度-研究-中国-东晋时代
IV. ①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5821 号

书 名: 东晋门阀政治

著作责任者: 田余庆 著

责任编辑: 刘 方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0435-1/K · 084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22.25 印张 260 千字

1989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5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自序

《东晋门阀政治》一书,论述从公元4世纪初年至5世纪初年的百余年间,江左几家侨姓门阀士族与司马氏皇权结合而运转的政治历史。东晋门阀士族的兴替和门阀政治的发展以至消亡,从本书首尾相衔的各题中,大致可以看出其内在的关系。

本书前七题,依次论述各家士族当政时期的历史,藉以显示东晋门阀政治的阶段性。为了弄清某些比较隐晦的历史内容,作了较多的考证。《后论》之作,一方面是想把前面各题的论述加以贯通,以明本书脉络所在;另一方面是想对作为本书主旨的东晋门阀政治的内涵外延,试作补充说明。

门阀政治,中国学者见仁见智,原无一致的理解。国外著作也颇有异说,多数人接受贵族政治的解释而对具体问题各有主张。有的学者释之为寡头政治。这种种解释无疑包含了许多精辟之见。只是,学者们或多或少地受西方古史研究影响,无形中假借了西方古史概念,一般不太重视中国古代久已形成皇权政治传统这一历史背景。而且,中外学者多是概括江左五朝、江左六朝,甚至整个魏晋南北朝历史而笼统地谈门阀政治,也就是说,他们倾向于认为门阀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之久,而较少从发展中考察门阀政治。

本书所指门阀政治,质言之,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

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本书定名为《东晋门阀政治》,原意并不是截取历史上门阀政治的一个段落加以研究。在作者看来,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前此的孙吴不是,后此的南朝也不是;至于北方,并没有出现过门阀政治。门阀士族存在并起着不同程度政治作用的历史时期,并不都是门阀政治时期。这是本书的核心思想,也是本书《后论》企图着重说明的问题。

本书偏重于政治史方面的研究,但不是全面的东晋政治史;它以江左几家侨姓士族的兴衰为线索进行考察,但也不同于各个士族门户的个案研究。书中旁及军事、地理、文化、经济诸问题,只限于阐明门阀政治的需要,一般不作详尽论述,以免骈枝之累。

文稿写成后陆续请北京大学历史系周一良教授、祝总斌教授看过,在材料和论点上都得到他们精心指正,谨此致谢。

本书有参考未备、论断不当、史料失误以及其他不妥之处,统祈读者赐正。

作 者

1986年1月于北京

目 录

释“王与马共天下”/1

- 一 西晋诸王与王国士人/1
- 二 司马越与王衍/6
- 三 司马睿与王导 门阀政治格局的形成/16
- 四 关于“不与刘、石通使”问题/26

论郗鉴

——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37

- 一 小 引/37
- 二 郗鉴的密谋/40
 - (一) 东晋初年的兵力状况/40
 - (二) 流民与流民帅/43
 - (三) 用流民帅平王敦之乱/49
- 三 郗鉴与王导/52
 - (一) 郗、王家族的结合/52
 - (二) 苏峻乱平后的江州/59
 - (三) 郗鉴在陶、王矛盾和庾、王矛盾中的作用/62
- 四 郗鉴与京口经营/70
 - (一) 三吴的战略地位/70
 - (二) 会稽——三吴的腹心/74

- (三) 建康、会稽间的交通线/78
 - (四) 京口和晋陵地区的环境与流民/84
 - (五) 京口在政治、军事上的作用/88
 - (六) 郗氏家族在京口的影响/92
- 五 余 论/96

庾氏之兴和庾、王江州之争/100

- 一 庾氏之兴 庾亮巩固门阀政治/100
- 二 庾亮出都以后的政治形势/107
- 三 庾、王江州之争/112
- 四 襄阳的经略/123

桓温的先世和桓温北伐问题/132

- 一 桓温先世的推测/132
 - (一) 桓温先世的隐情/132
 - (二) 桓温是桓范后裔/133
 - (三) 桓范的郡望问题/139
 - (四) 旁 证/142
 - (五) 小 结/145
- 二 桓彝事迹杂考/147
 - (一) 中朝桓彝无令誉/147
 - (二) 桓彝过江后跻身“八达”而又志在立功/149
 - (三) 桓彝族单势孤/152
 - (四) 桓氏家族不为时人所重/155
 - (五) 小 结/157
- 三 永和政局与永和人物/159
- 四 桓温北伐与东晋政争/169

五 简文帝遗诏问题/176

陈郡谢氏与淝水之战/189

- 一 谢鲲、谢尚与谢安/189
- 二 北府兵/202
- 三 淝水之战前后的陈郡谢氏/208
- 四 淝水之战与灭吴之战的比较/219
- 五 北方民族关系与淝水之战性质问题/228

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244

- 一 小 引/244
- 二 “虬王”世家/245
- 三 孝武帝与皇权政治/251
- 四 主相相持与太原王氏/259
 - (一) 主相相持的开端。太元九年至十四年(384—389)/260
 - (二) 上下游的争夺——王忱与王恭。太元十四年至十七年(389—392)/262
 - (三) 殷仲堪入荆与孝武帝得势。太元十七年至二十一年(392—396)/265
 - (四) 孝武帝死后王恭、殷仲堪连兵叛乱——两藩与中枢之争。太元二十一年至隆安二年(396—398)/267
 - (五) 太原王氏的覆灭。隆安二年至三年(398—399)/270
- 五 小 结/272

刘裕与孙恩

——门阀政治的“掘墓人”/278

- 一 晋末的北府兵/278

- 二 北府将乐安高氏/287
- 三 道术与政治/293
- 四 孙恩、卢循、徐道覆的家族背景/300
- 五 孙恩、刘裕与次等士族/307

后 论/315

- 一 旧族门户和新出门户/315
- 二 东晋侨姓门阀士族的主要来源/320
- 三 门阀政治——皇权政治的变态/324
- 四 门阀政治和流民/331
- 五 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333
- 六 门阀士族的文化面貌/338
- 七 门阀政治的暂时性和过渡性/343

改版题记/347

释“王与马共天下”

一 西晋诸王与王国士人

《晋书》卷九八《王敦传》：“〔元〕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①

《南史》卷二一史臣论曰：“晋自中原沸腾，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国，年移三百，盖有凭焉。其初谚云：‘王与马，共天下’。盖王氏人伦之盛，实始是矣。”

琅邪王氏诸兄弟与晋琅邪王司马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成密切关系。王导以他所居司马睿左右的关键地位，艰苦经营，始奠定东晋皇业和琅邪王氏家业在江左的根基，因而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语。王与马的结合，开启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东晋初年诸帝，待王导以殊礼，不敢以臣僚视之。《世说新语·宠礼》：“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元帝）引之弥苦。王公曰：‘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下何以瞻仰？’”^②元帝

① 《通鉴》太兴三年（320）录“王与马共天下”之语，谓其时“敦总征讨，导专机政，群从子弟布列显要”云云，得实。“王与马共天下”局面的形成，王敦所起的实际作用不比王导小。本文从中枢政局着眼，只论王导。

② 《晋书》卷六五《王导传》略同，“元帝正会”作“帝登尊号”，无“中宗引之弥苦”句。

对王导，素以“仲父”相尊。成帝给王导手诏，用“惶恐言”、“顿首”、“敬白”；中书作诏则用“敬问”。成帝幸王导宅，拜导妻；王导元正上殿，帝为之兴^①。

“王与马共天下”，这并不是时人夸张之词，而是一种确有实际内容的政治局面。《晋书》卷六《元帝纪》，永昌元年（322）王敦兵入石头，元帝遣使谓敦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则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当归于琅邪，以避贤路。”同书卷九八《王敦传》记元帝言曰：“欲得我处，但当早道，我自还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元帝此时不敢以君臣名分责王敦，只得委曲求全，企图维持与王氏的共安。他请求王敦不要擅行废立之事，不要破坏“共天下”的局面。如果王敦执意独吞天下，破坏共安，元帝无以自持，就只有避住琅邪国邸这一条路可走。

征之历史，“共天下”之语，古已有之，并不始于两晋之际的王与马。《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不韦为子楚谋秦王之位，子楚感激，顿首曰：“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子楚允诺吕不韦共有秦国，这就是后来子楚得立为庄襄王，并以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的缘由。《史记》卷七《项羽本纪》，汉五年刘邦击楚，诸侯约而不至。张良曰：“楚兵且破，〔韩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汉书》卷一《高祖纪》记此事，“共分天下”即作“共天下”，师古注曰：“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分之。”这就是刘邦发使割陈以东傅海之地与韩信，割睢阳以北至谷城之地与彭越的缘由。

由于时代的推移变化，裂土以“共天下”的情况，西汉以后已

^① 分见《晋书》卷六五《王导传》，卷三九荀奕、卷七八孔坦等传，卷一二《天文志》以及《太平御览》卷三九五引《晋中兴书》。参看《十七史商榷》卷四八《敬司徒王导下（不）》条。

经不存在了。“王与马共天下”，不再是指裂土分封关系，而是指在权力分配和尊卑名分上与一般君臣不同的关系。王与马的这种名器相予、御床与共的关系，发生在东晋创业、元帝壮年继嗣之时，不是末世权宠礼遇非凡，也不是阿衡幼主僭越名分一类不正常的情况。王导以一代名相处此而当世多不以为非分，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①。

为什么江左会出现这种政治局面呢？总的说来，偏安江左是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产物，而江左政权依赖于士族，则是门阀制度发展的结果。士族高门与晋元帝“共天下”，归根到底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但是这还不能说明为什么是琅邪王氏而不是别的高门士族与晋元帝“共天下”的问题。晋元帝与琅邪王氏之间，尚有其历史的和地域的特殊原因，使之相互固结，因而形成王与马的特殊关系。

西晋诸王，或随例于太康初年就国，在其封国内有一段较长的活动时间；或虽未就国，但与封国有较多的联系。他们一般都重视与封国内的士人结交，甚至姻娅相联，主臣相托^②，形成比较密切的个人和家族关系。东汉守、相例辟属内士人为掾，此风在西晋时犹有遗留。西晋诸王辟王国人为官之事，史籍所载不乏其例。《华阳国志·后贤志》：常骞，蜀郡江原人，“以选为国王侍郎，出为

① 明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四《相鉴》谓“自古大臣殊礼，至于赞拜不名而止，过则不臣矣。”于氏盖就北周太宰宇文护故事立论如此，并谓至宇文护，“诏诰及百司文书，并不得称公（护）名，甚于赞拜不名矣。……当此之时，识者已为之寒心矣。”于氏所论不及东晋王导事，似欠周全。

② 诸王与王国官有君臣名分，至刘宋时始有诏禁止。《宋书》卷六一《江夏王义恭传》载，孝武帝欲削弱王侯，讽有司就江夏王义恭及竟陵王诞希旨所陈九事增广为二十四事，其一为“郡县内史相及封内官长于其封君既非在三，罢官则不复追敬，不合称臣，宜止下官而已。”诏可其奏。案，州郡长吏与掾属间有君臣名分，东汉已是如此，诸王与王国官属有君臣名分，更不待言。

繇竹令,国王^①归之,复入为郎中令。从王起义有功,封关内侯,迁魏郡太守,加材官将军……。”案同书《大同志》太康八年(287)^②成都王颖受封四郡,蜀郡在其封内。由此至永宁、太安年间,蜀乱,成都王颖徙封荆州南郡四县(《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为止,历时十余年之久。所以司马颖与成都王国士人关系甚多,是可能的。《晋书》卷九〇《良吏·杜轸传》,成都人杜轸,子毗,“成都王颖辟大将军掾”;轸弟烈,“为成都王颖郎中令”,皆属此例。《世说新语·贤媛》注引《晋诸公赞》:孙秀,“琅邪人。初,赵王伦封琅邪,秀给为近职小吏。伦数使秀作书疏,文才称伦意。伦封赵,秀徙户为赵人,用为侍郎。”孙秀于赵王伦篡位后为中书令,政皆决之。《世说新语·仇隙》注引王隐《晋书》以及今本《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皆著其事迹,更是显例。《晋书》卷五四《陆机传》、《陆云传》,机、云兄弟,吴郡人,吴王晏出镇淮南,先后辟机、云兄弟为王国郎中令。《抱朴子·自序》丹阳葛洪,父为吴王晏郎中令,而丹阳亦吴王所食三郡之一。此皆王国辟属内士人之例。依成都国、琅邪国、赵国、吴国诸例推之,司马睿一系之琅邪王与琅邪国内士人交往,因而形成比较牢固的历史关系,是当然之事。

诸王所辟或所与交游的王国士人,如果出于国内著姓士族,其关系可能更为不同。司马睿之祖司马卞于西晋平吴之前徙封琅邪王,其时琅邪国内最显门第,当数临沂王氏。据《晋书》卷三三《王祥传》,琅邪临沂王祥于曹魏黄初年间为徐州别驾,讨破利城兵

① 案前一“国王”疑当作“王国”,后一“国王”疑当作“国人”。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于前一“国王”亦谓“当作王国”,于后一“国王”则未出校语。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59页注^②则说:“‘国王侍郎’,谓在邨之王府官;‘出为绵竹令’,自邨出也。‘国人归之’,颖复召还之也。”此说似嫌牵强。

② 据《晋书》卷三《武帝纪》,成都王颖始受封在太康十年,同书卷五九颖本传,谓太康末受封邑。

变,时人歌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北堂书钞》卷七三引王隐《晋书》,谓王祥“以州之股肱,纠合义众”,可证王祥有宗族乡党势力可资凭借。自此以后,王祥位望日隆,历居魏、晋三公之职,王氏宗族繁衍,名士辈出。像琅邪王氏那样业已显赫的家族,本不待琅邪王的辟举以光门户;而琅邪王欲善接国人以广声誉,却特别要与琅邪王氏结交。司马佃(死于太康四年,283)、司马颢(死于太熙元年,290)以及司马睿三代相继为琅邪王,与琅邪王氏家族交好联姻,前后历数十年之久。所以王氏兄弟与晋元帝司马睿在述及王、马关系时,总说是朋友之情、手足之谊。例如王导与晋元帝“契同友执”^①，“有布衣之好”^②；晋元帝曾对王敦说：“吾与卿及茂弘（王导）当管鲍之交”^③；王廙是晋元帝姨兄弟，他在疏中说：元帝与他“恩侔于兄弟，义同于交友”^④。除王氏以外，琅邪国内其他士族如诸葛氏、颜氏以及各色人才，司马睿亦广为结交，以尽其用。当司马睿过江为镇东将军时，《晋书》卷七七《诸葛恢传》谓“于时王氏为将军，而恢兄弟及颜含并居显要，刘超以忠谨掌书命，时人以帝善用一国之才。”^⑤“一国”，琅邪国也。

王、马关系固然有个人情谊为纽带，但又不仅如此，它更是一种以家族集团利益为基础的长期发展起来的相互为用的政治关系。如果家族集团利益发生矛盾，个人情谊一般就不起什么作用了。所以当西京覆没，元帝将立时，王敦居然“惮帝贤明，欲更议

① 《晋书》卷六五《王导传》。

② 《世说新语·言语》“顾司空未知名”条注引邓粲《晋纪》。

③ 《晋书》卷九八《王敦传》。

④ 《晋书》卷七六《王廙传》。

⑤ 案诸葛恢为琅邪阳都人，颜含及刘超均琅邪临沂人。《北齐书》卷四五《文苑·颜之推传》载《观我生赋》：“吾王所以东运，我祖于是南翔。”原注：“晋中宗以琅邪王南渡，之推琅邪人，故称吾王。”这也可证诸王与王国士人的密切关系。

所立”^①；明帝初立时，“敦素以帝神武明略，朝野之所钦信，欲诬以不孝而废焉”^②。元帝惮王氏家族太强，也图用亲信以抑王氏。当王氏家族极力抗拒此举，甚至王敦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叛乱时，以恭谨见称的王导实际上也站在王敦一边。所以“共天下”云云，并不是王与马平衡的稳定的结合，而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出现，又依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政治现象。当王氏家族认为有必要又有可能废立或自代时，“王与马共天下”的平衡局面就会有破裂的可能。当王氏家族的权势盛极而衰时，别的家族也可以起而代替王氏居于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地位。

南宋陈亮有感于晋宋偏安，如出一辙，山河破碎，吊古伤今，在所作《念奴娇·登多景楼》一阕中发问慨叹：“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门阀政治，也就是“门户私计”的政治，严格说来，只限于东晋，孙吴时还没有，南朝时又成过去，“六朝”云云，是陈亮误解之词。而东晋一朝的门阀政治，则是贯彻始终，发其端者，是琅邪王氏。

琅邪王氏王导、王敦兄弟与司马氏“共天下”，开创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建立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诠释两晋之际的王、马关系，探索其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是理解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重要一步。

二 司马越与王衍

“王与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形成，既是琅邪王与琅邪王氏的

① 《晋书》卷六五《王导传》。

② 《晋书》卷六《明帝纪》，未著年月。案《世说新语·方正》“王敦既下”条及注引刘谦之《晋纪》以及《太平御览》卷四一八引《晋中兴书》均载此事。《御览》所载温峤反对王敦之谋，有“当今谅闇之际”语，可知事在元帝已死、明帝初立之时。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有考。

地域结合,又有其历史原因。王马结合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西晋八王之乱后期即东海王司马越与成都王司马颖对峙期间司马越与王衍的关系。

八王之乱后期,惠帝子孙全都死亡,惠帝兄弟成为其时司马皇统中血统最近的亲属。成都王颖抢得了皇位继承权,称皇太弟,居邺城遥制洛阳朝政。东海王越是八王之中最后参与乱事的藩王。按血统关系说,东海王越是司马懿弟东武城侯司马馗之孙,高密王司马泰之子,于武帝、惠帝皇统是疏而又疏,同成都王颖居于惠帝兄弟地位者大不一样。按食邑数量说,成都王本食四郡,东海王只食六县,大小轻重迥不相同。永兴元年(304)七月荡阴战后,惠帝被劫入邺,成都王颖更成为决定性的政治力量。但是不久,党于东海王越的幽州刺史王浚发兵攻邺,成都王颖和惠帝以及皇室其他近属逃奔洛阳,被河间王颙部将裹胁入关。这时候,惠帝兄弟辈二十五人中,只剩下成都王颖(原来的皇太弟,入关后被废)、豫章王炽(入关后新立的皇太弟,后来的晋怀帝)和吴王晏(后来的晋愍帝司马邺之父)^①。惠帝和宗室近属悉数入关,广大关东地区没有强藩控制,这是东海王越填补空缺、扩充势力的大好时机。东海王越的势力就是趁这个机会扩充起来的。

荡阴败后,司马越回东海国,又收兵下邳,取得徐州,控制江淮,进行了大量的活动^②。从此,徐州地区成为他的广阔后方。他

① 参阅《通鉴》永兴元年(304)十二月丁亥条。

② 《晋书》卷七一《孙惠传》,记孙惠此时以书干谒司马越,谓越“虎视东夏之藩,龙跃海隅之野(指在东海国和东方各地活动,并收兵下邳),西咨河间(河间王颙),南结征镇(征南司马虓,督豫州;镇南刘弘,督荆州,均党于越),东命劲吴锐卒之富(扬州刘准),北有幽并率义之旅(幽州越党王浚,并州越弟司马腾),宣喻青徐(青州越弟司马略,徐州司马徽),启示群王,旁收雄俊,广延秀杰,纠合携贰……”云云。这大体是其时司马越势力分布图。

部署诸弟司马腾、司马略、司马模分守重镇以为形援。然后他移檄征、镇、州、郡，自为盟主，并于光熙元年（306）把惠帝从长安夺回洛阳。接着，惠帝暴死，成都王颖、河间王颙相继被害，继立的晋怀帝完全在司马越的掌握之中。司马越在皇族中已没有强劲的对手，八王之乱至此告终。胜利的司马越赢得了疮痍满目的山河，也独吞了八王之乱的全部恶果。匈奴刘渊、羯人石勒的军队动辄威胁洛阳，使司马越不遑宁处。

司马越并不具备皇室近属的名分，号召力有限。因此他力求联络关东的士族名士，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力量来支撑自己的统治。关东是士族比较集中的地方，他们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司马越统治的命运。但是关东士族同宗室王公一样，在十几年的大乱中受到摧残。有些人鉴于政局朝秦暮楚，尽量设法避祸自保。名士庾敳见王室多难，害怕终婴其祸，乃作《意赋》以寄怀，宣扬荣辱同贯，存亡均齐思想。还有一些人逃亡引退，如吴士张翰、顾荣辞官南归，颍川庾袞率领宗族，聚保于禹山、林虑山。这种种情况，反映了很大一部分士族名士的避世思想和政治动向。司马越必须在星散的士族名士中找到有足够影响的人物列于朝班之首，才能号召尽可能多的士族名士来支持他的统治。夙有盛名的琅邪王衍被司马越看中，他们密切合作，共同经营一个风雨飘摇的末代朝廷。

王衍郡望虽非东海，但却是东海的近邻。王衍家族的社会地位，高于东海国的任何一个家族。王衍是其时的名士首领，以长于清谈为世所宗。据说此人终日挥麈谈玄，义理随时变异，号曰“口中雌黄”，朝野翕服。《世说新语》一书，记载了清谈家王衍的许多轶事。不过王衍的玄学造诣，声大于实，史籍中除了记他祖述何晏、王弼“贵无”思想和反对裴頠的“崇有”之说等寥寥数语以外，不言他对玄学究竟有什么贡献。清人严可均辑《全晋文》，竟找不